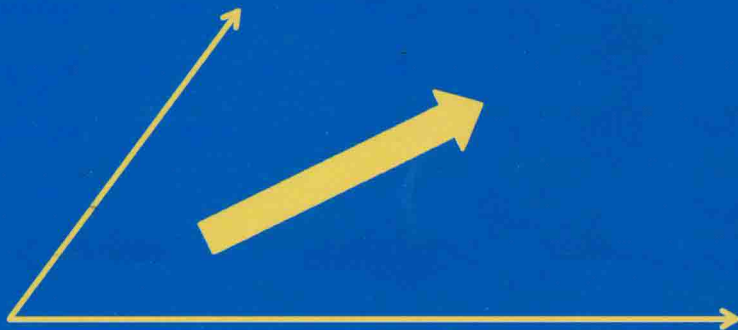


C 中国模式 China Model

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

Gradual Institution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Space Involution

杨永春 著



1980s 实验开放 ——— 1990s 半开放 ——— 2000 年以后全方位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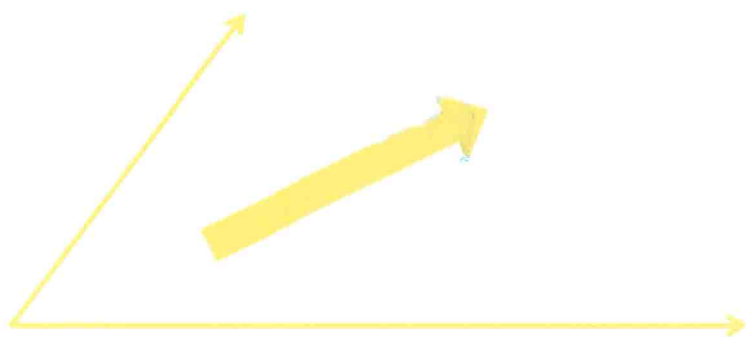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出版社

C 中国模式 China Model

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

Gradual Institution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Space Involution

杨永春 著



1980s 实验开放 ——— 1992年开放 ——— 2000年以后全方位开放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模式: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杨永春
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311-04206-6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区位经济—经济格局—
经济模式—研究—中国 IV. F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0096 号

责任编辑 陈红升
封面设计 余音

书 名	中国模式——渐进制度转型与地理空间演变
作 者	杨永春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45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206-6
定 价	4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中国历史上至少曾出现过三次根本性的制度变迁。第一次是夏商周时期的奴隶制,中国出现了长达八百年的周王朝。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以秦孝公和商鞅变法为标志的封建制度的建立,中国出现了享誉世界的汉唐盛世和东方文明体系。第三次是清末以来为应对民族生存危机,促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进行的系统化制度探索。客观上,前两次制度变迁是建立在中国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碰撞产生的历史性进步,属于大洲空间层面和面对落后的文化体系。清末以来的这一次制度变迁是在中华民族深陷西方列强瓜分的生存危机和中华文明是否需要根本性转型的反思背景下开始的,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全球层面面对先进技术和先进文明大规模侵入的碰撞(西方海洋文明与中国陆地文明的全面性主动碰撞),是中国发展第一次真正由单一的陆地文明国家变为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并重的文明转型国家。这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全面吸纳全球层面的优秀制度、文化和技术成果,推动自身古老文化发生质变的制度变迁,也是中华文明历史上触及文化灵魂的根本性制度变革之一。因此,中国模式不仅指经济制度转型及其发展模式,更是中国东方文明在21世纪的新内涵、新形象的确立和展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根本性、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制度变迁,将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基于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模式,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领域都发生了质变,即: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已从基于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和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社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由自给半自给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村落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转化,从同质文化社会向异质文化社会转化(由同质的单一性走向异质的多样性),从刚性结构社会向弹性结构社会转化,从不可持续的工业文明开始向可持续发展的后现代社会转型(王永进,邬泽天,2004;李德,郝秋华,2008)。虽然至少在经济制度上可理解为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但实质是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可视为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广泛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的一部分(吴缚龙等,2007;Shen,2007;Bennett,1997)。

国际学术界和政界已将过去三十余年中国制度转型的巨大成功(国家稳定、高速增长、社会活力、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平崛起)归纳为中国模式或中国范式(China Paradigm),并认为其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渐进主义(Gradualism)两种过程(Cook &

Murray, 2001; Lardy, 1998; Ma, 2001; Wu, 2002) 的成功耦合 (Jefferson & Rawski, 1994; Liberal, 1995; Noland, 1995; Laffon & Qian, 1999)。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私有”的混合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始终处于演化过程之中,并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以及存在多样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价格形成机制(保建云, 2007)。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国有企业的重构和外向型工业的发展(Wu and Zhang, 2008),被誉为“世界工厂”。

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革可归纳为二元性、耦合性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Nee, 1989, Qi, 1992, Wei, 2001)、政府化(计划性)、渐进性七大特点或路径。我国制度变迁路径的耦合性特征显著,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逐步转型和相互耦合,相互提供转型条件,制度改革、对外开放、市场培育、社会结构、文化多元、地域空间组织六大系统同步转型、相互耦合、螺旋递进,稳健地将国家的改革开放逐步推向深入。由此,我国深刻的制度变迁、持续的经济增长、日益广泛的社会文化转型推动了区域或城乡的空间结构、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其演进历程根植于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转型之中。

Henri Lefebvre(1991;1993)认为“空间表面上是透明的、反射性的和反思性的,然而它没有任何的纯洁性。它本身也是根据‘生产者’的意见和利益被生产出来的……它偶尔在表面上是一个必需能量的和欲望的空间,尽管它是那些被过滤的和制度化的欲望的空间”,“找到一种统治性的知识的关键和实质——为社会的操纵和枢纽提供一种社会的转型、一种新的理性。社会的真实是变化的,因为生产性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形式是变化的。人们将物品生产过渡到了对这样的空间的直接生产”,“……资本主义只是通过向整体空间的扩张才得以保存的(通过侵入它的发源地,侵入增长领域和权力领域:生产的统一性、企业、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因此,“空间的生产仅仅是生产出了差别性的空间……空间被人为地稀有化了,被片面化、碎片化了,以便整体和部分的用来出售。它是分割的场所。通过空间,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空间”,“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存在于空间里。空间形式发挥着作用。对土地垄断、对空间的垄断,这两方面对垄断资本主义里的土地和空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会导致空间的资本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也将生产出一个新的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生产出全新的社会关系,并“尽量摆脱国家的束缚,试图‘浓缩’他们自己所建立的这些空间”,这必将导致空间所包含的“交换—使用、中心—边缘、总体—局部、均质性—差异性、生产—自我毁灭”等诸多矛盾在中国城乡空间转型过程中的逐步暴露和激化。

本质上,中国的制度变迁探索需要最终回答两个难题:一是人类社会是否只有单一化的终极理想制度模式?二是中华文明是否能成为与西方文明并存的另一极?因此,中国制度变迁和空间演进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和文明类型学意义的伟大尝试,是与基于古希腊、古罗马和西欧各国的西方文明体系进行相互印证和比较的伟大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社会所做的伟大贡献之一。现实中,我国还需要摸索至少三个问题:一是确立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二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文化的新形态、新结构和管理的新框架;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互边界的确定和高效融合,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背景下能否实现计划性和市场性的完美统一,并尝试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

实践证明,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多民族融合、文化碰撞和生存危机总能让中

华民族产生巨大反弹;制度建设和文明演进发生质的进步。1978—2012年,中国成功的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已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的30—50年,中国的制度探索应以探索中国民主模式为己任,寻找中华文明再次腾飞的“东方”路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向新的历史起点,早日实现中国梦!对中国制度变迁及其与地理空间演化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从地理学视角透视中国制度转型背景下中国地理空间变化及其所存在的问题。这本著作是笔者十余年来思考的结晶和心血之作,试图采用制度学派、结构学派(The Structural Approach)、行为学派(The Behavioral Approach)的思想与方法,从理论层面分析和透视中国此次制度转型历程及其对中国空间演化的影响机制,也是继以实证研究为主的《中国(西部)城市转型的多维透视》的第二本关于中国制度转型的地理学视角的著作,尝试进行“转型地理学”研究。

作者非常感谢学界人士的卓越论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宋长青主任、冷疏影主任、兰州大学陈发虎副校长等人士的长期指导以及兰州大学出版社陈红升主任的大力支持。同时,我的研究生杨佩、卢红和王宏光和豆晓帮助清绘了部分插图,博士生张德利、刘润帮助校对了稿件,在此一并致谢!鉴于此次中国大陆制度转型的渐进性、复杂性和系统性,拙作存在不妥之处还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杨永春

2013年3月于兰州

目 录

1. 渐进制度转型的路径与特征 001

- 1.1 东方文明:祖宗的遗产、独特国情与中国制度转型路径 002
- 1.2 政治制度安排:经济分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023
- 1.3 渐进经济制度变迁:市场化、政府化与二元经济体制 027
- 1.4 文化思想:内外冲突、整合与多元文化体系 042
- 1.5 历史视角:中国此次制度变革的文明价值与归宿 046

2. 渐进制度转型下的地理空间驱动机制 066

- 2.1 渐进制度转型推动地理空间演化机制:综合性与整体性 067
- 2.2 经济增长与梯度转型原理:市场化与全球化 069
- 2.3 制度非均衡供给的空间转型原理:资本化、二元化 078
- 2.4 垂直管理模式下推动-制衡原理:区域间的竞合 093
- 2.5 渐进流动性控制原理:社会分化、流动与社会空间分化 103
- 2.6 文化空间的混沌进化原理:模糊导向与景观多元 129

3. 渐进制度转型下的区域空间格局与机制 139

- 3.1 计划经济时期区域发展的制度设计及均衡空间布局 140
- 3.2 制度变迁推动下的空间战略与机制 142
- 3.3 基于制度变迁的区域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149

4. 渐进制度转型下的城市空间格局与机制 153

- 4.1 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垂直镶嵌的蜂巢空间组织 154
- 4.2 转型期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宏观制度逻辑 158
- 4.3 制度“洼地”与资本循环:城市空间重构的微观机制 171
- 4.4 城市空间分化与重构的多元路径 179
- 4.5 城市空间重构下的多元“镶嵌”结构 195
- 4.6 城市空间重构下的社会文化后果 206

5. 渐进制度转型下的中国乡村空间变迁 209

- 5.1 区域性乡村功能的转型与城乡整合 210
- 5.2 村落内部空间分化与整合:扩张、空心化与农村风貌 216

6. 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与空间关系 223

6.1 转型中的文化价值观：中华文明创新与空间新观念 224

6.2 乡土文化：情感投资与网络取向 225

6.3 家庭文化：多元文化与居民住区选择 226

6.4 家族观念：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运营模式 231

7. 渐进转型后期：展望未来的中国模式 232

7.1 渐进模式：转型时间表与制度变迁路径 233

7.2 从传统到现代：社会流动与现代中国社会管理 252

7.3 空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空间公平 258

参考文献 261

1. 渐进制度转型的路径与特征

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生存竞争和淘汰适应过程的结果;而康芒斯则认定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为,所谓集体行动的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运营机构。现代制度主义者诺思(1994)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一种博弈规则,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它是由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习俗、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及他们的实施特点构成的。科斯(1994)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对它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只有当这个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能发现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形成规模经济,使外部性内部化,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费用,才能使人们的总收入增加,创新者才可能在不损失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获取利益,而这种利益的驱动力正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模型(卢现祥,2004)。

人类社会演进历程和制度模式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系统相互耦合、相互促进的结果。其中,任何一种系统的负干扰都会使其对应的社会系统的正常制度演进过程走向迟滞、扭曲甚至崩溃!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初始条件(the initial conditions),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渐进的制度变迁路径实现了我国历史有记录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体制和全球罕见的深入人心的改革文化(李稻葵,2012),实际上也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仍在进行中,亦是市场转型与制度惯性并存,中国是“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渐进式转型,而非中东欧国家急剧转为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Bian and Logan, 1996; Lin N and Bian, 1995)。

中国的制度变革范式具有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渐进性、二元性、政府性、耦合性的七大显著特点。我国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模式是私有经济部分和国有(单位)系统混合存在的二元结构体系,这是“国民”双系统的体制性根源。同时,社会管理体制部分延续了城乡户籍二元管理制度,文化演进也存在典型的多元碰撞和融合。这导致了城乡空间转型存在单位空间市场化倾向、市场空间资本化(商业化)、公共空间缩小化和商业化的三元空间体系,三者相互转化,形成城乡空间结构的镶嵌体。

中国社会经济过去30年的成功源于改革开放时期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的制度安排,目前面临的问题或困境的根本解决也同样将取决于今后30年的制度安排,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完善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演进路径。

1.1 东方文明：祖宗的遗产、独特国情与中国制度转型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行为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这成为制度变迁的根本诱因。由于潜在的利益或利润不可能通过既有制度结构获得,所以就必须对制度再安排或创新。

1.1.1 中国的历史遗产

商鞅变法、戊戌变法、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制度转型,而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延续。

1. 中国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其反思

历史上,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的制度演化进程大致形成了探索、顶峰、衰退、再探索的典型轮回,这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框架三个相辅相成的耦合进程,体现了中华文明进步的历史轨迹和无畏的探索精神。不过,近代以前的我国制度变迁几乎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而之后的制度变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际环境的制约。

(1) 制度探索：从原始公社制度到制度多元化争鸣

中国的原始社会解体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这个奴隶制国家后,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原始民主体制——选贤任能的“禅让制”模式的消亡。随后,因为无能、无道的中央执政者会引起政权分裂或/和诸侯联合“逼宫”(地方拥有很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权力,在一定时期会导致中央—地方力量对比达到或超过均衡点),或外敌觊觎(如戎狄入侵引起西周灭亡)等,西周的诸侯分封制和藩国臣服制也失去了制度实施的实践基础,并导致王道学说及其治国理念(《诗经》中的经典语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通过掌控土地达到控制全社会的目的,而人民臣服于“王权”)的破灭。中国的奴隶体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的奴隶民主制度或城邦制度,走向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双层社会结构的阶级社会,中间缺少强有力的平民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在“大争之世”争相“大鸣”,并经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齐国整顿吏治、秦国商鞅等制度变迁实践后,最先确立了以法家法统思想(如荀子等认为人性本恶,需要以法治才能寻求社会进步)为核心的秦国封建帝制,进入到皇权“家族承继模式”的帝制时代。以李悝、申不害、商鞅变法为代表推动了法统帝制的探索,成功地确立了法统模式的封建制度和“大一统”的中华模式(统一的文字、度量衡、交通体系和官制等);取消分封制和采用郡县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尝试建立法统社会的价值观、建立了重农抑商的经济传统(认为商业从根本上会危害国家经济建设,懈怠社会精神)等。然而,秦帝国却因法制讲求速治和在国内采取了激进方式的法制推行政策,以及秦统一六国后没有及时的“于民休养”,陷入了“苛政”泥潭,尤其是秦始皇权力交接的失策,导致这一制度模式探索的迅速夭亡。西汉初年,自刘邦到汉景帝初年,在保留秦帝国制度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采纳了老子道家学说中“无为而治”(主张对经济发展采取政府不干预制度,减少政府低效管理的影响)的思想,于民养息,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这种学说适合于社会生产力恢复时期,在社会失衡、争霸、战争等特殊时期下必被统治者所抛弃。

(2) 制度效应:汉唐盛世与中华文明的兴衰轮回

汉武帝时期,放弃了西汉初年执政的黄老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以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中国自此走向了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政治制度——人治模式。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只是对这个帝国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并在汉唐和宋元时期达到了这个制度设计——东方文明的辉煌和鼎盛,威名远播海内外。

汉唐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特点包括:①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秦代实行郡县制,避免了诸侯分封制度形成的“地方独大”的政治问题。景帝以后,中国一般都实行了郡县制度,虽也时有分封现象出现,但因规模小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并不大。这个制度实际上将人、财、军等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是执行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然而,如果中央政策长期有问题以及在中央—地方的政治经济博弈中失败,则会出现“地方割据”问题,引起类似“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动荡。②中央政权设计中虽然拥有类似政府—司法—监察,或者政府—司法—议会的制度架构,但都以皇权凌驾于这个三分系统之上为基本特征。如果皇帝治国有误、无方或破坏了三分系统的均衡,或者皇权与相权的均衡被打破,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政治问题。③孔孟之道认为人性本善,认为社会通过“仁爱”和“教化”,以及等级化的“礼制”就可达到社会“大治”。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化的社会思想构架,如“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而且,虽然思想上追求广义“爱”的“仁治”,但在这种“非对称”的思想和制度框架下,很快就会出现难以制衡的社会倾斜式的“失衡”,因为君、夫、父等获取了没有现实制度约束的绝对“权力”或话语权,仅靠天意示警、“民为重、君为轻”这样的“软约束式”的教化制约皇帝或官员的行为,只能取得短期效应或者建立在“好皇帝”出现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合理、强大的制度才能制约权力的“魔鬼化”作用,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国君或皇帝才能理解并遵循儒家的教诲,而大多数的统治者最终都会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引起上层建筑和下层社会的冲突,最终导致朝代更替、政局动荡和社会失衡。

令人深思,汉武帝时期一直到清末,多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这个帝国制度的本质。因为阶级社会下的封建帝制无法根本解决皇族代代总有治国大才或英才,这导致“好皇帝”和“坏皇帝”轮番出现,即这个政治制度无法解决“坏皇帝”、“无能皇帝”、“傀儡皇帝”、“昏庸皇帝”执政时的政治权力失控问题,这直接导致了以土地兼并、财富集聚、权力失控为核心特征的社会失衡状态,并最终引发农民起义或藩镇割据等社会动乱。由此,中华文明出现了兴旺—动荡—恢复—兴旺的历史轮回:新王朝或新政权往往都采取了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经济体制,只因在一定时期抑制或控制了土地兼并的程度、政治较为清明(基于儒家思想,各级官吏宽仁爱民、吏治清明、土地兼并程度低、赋税适度,土地经济的社会利益分割和财富分配相对均衡),国家则处于稳定、繁荣和辉煌的兴盛期;反之,国家就出现土地大规模被兼并、官员贪污腐败、财富分配两极化和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几乎每次王朝更替都伴随着激烈的暴力运动和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并导致中国社会无法实现新的超越。例如,宋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社会形态虽然较为发达,但实际上还是农耕社会的经济框架。在中央集权的支持下,商业依附于农业,地位低于农耕阶层,受到官吏盘剥,虽然

(3)制度再探索:从清末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清末,中国又到了文明循环中的衰败、动荡期,外敌乘机入侵,原有的政治模式和经济体系已无法应对内外双重的威胁和挑战。清末至1978年,中国社会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制度探索与转型时期,由封建帝制先后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1840—1911年的体制内改革。中国效法英国、日本等国,尝试建立君主立宪模式。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快速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刺激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深刻反省和救国图存运动,体制内的社会精英首先尝试进行制度变革,试图走向君主立宪制,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精英阶层试图通过引入西方先进的技术、企业和制度,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改良中国的经济、社会、军事体制,但随着对外战争的失败和清廷被推翻以失败告终。洋务运动败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败于其错误的改革战略,清末新政则败于中央权威的丧失。总体上,因为中国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微弱,文化惰性极其严重,不可能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那样轻易地取得根本性成功。

萧功秦先生精彩而深刻地分析了清末制度变革历程:①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开启了清王朝尝试“旧瓶装新酒”的改革模式:学习德皇威廉二世和日本明治天皇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即有效利用皇帝权威和官僚体制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推进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转型。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精英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既定目标。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属于自上而下改革模式的世俗理性觉醒过程,即国人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干扰,采用了效果、成效、实效的衡量标准,开启了中国变革的闸门,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所指出的,“仿效西方的军事器械,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要发展军事工业,就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就要发展轻工业;反过来,需要发展新式教育。这个循环促进转型和开放过程促使中国的变革持续深入”。不过,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牺牲了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②历时3个月的戊戌变法实际上源于一批从来没有“当官经验”的体制外“书生”(边缘知识分子)与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所组成的推动中国转型的精英势力集团。虽然这个改革集团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和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但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任何经验和没有充分认知改革的复杂性,心态上的危机感和强烈焦虑感使他们采取了一种焦虑型的激进型政治改革路线(如100多天竟发布了近300道改革的上谕,且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属于非系统化的改革),即梦想迅速、彻底、急剧的推动国家的开明专制化,触犯了广大官员的利益,最终遭到顽固的守旧派、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温和的改革派的联合孤立和扼杀。③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内容极其广泛的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化努力,并涉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然而,相当弱化的中央政府权威已不足以支持这个激进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系统化改革,导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和有序状态,使改革进程和社会危机相互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清末新政将权力分散到了地方(士绅控制的地方权力,地方谘议局又被激进的士绅阶层所把握),中央政府毫无权威且受到地方势力(既得利益者)的排斥,又无法满足1905年后国内士绅阶

层、官僚阶层所形成的立宪进步思潮的激进政治要求,形成了全社会的挫折感和一种政治爆炸状态。清末新政的失败表面上是发生了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中国当时根本无法立即进行立宪改革,这是因为地方政治势力已膨胀到足以对抗中央,乃至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后造成了中央政府内部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根本不是立宪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以立宪为口号和幌子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在明治维新二三十年以后才进入了立宪时期。所以,日本的政治学家清夫信三郎一语道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本质,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属于一种类型,它的实质是增加天皇和中央的权威。它以立宪作为一个符号,实质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化的过程,而中国却以为要现代化就要民立宪法,而且要学英国的真立宪。

第二,1911—1949年的体制外改革。立足三民主义,中国尝试建立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总统立宪制。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逐渐成为殖民地和封建主义较为浓厚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在“三民主义”的暂短制度实践中,前期为理想化的孙中山模式的“三民主义”,并引发了袁世凯帝制、张勋复辟的闹剧,后演变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假三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民国政府试图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但因连年混战、政治独裁而迅速走向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在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基础的高度落后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系统上,突然嵌入一个根本无法达到有效整合的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样,孙中山先生虽忠于三民主义和努力实践五权分立,但蒋介石却利用民主形式建立了专制独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

萧功秦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后,基于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主流的精英集团和一部分国民对西方文明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的强烈认同,以及清朝被推翻后各省已各自为政的客观事实,中国自然而然的走上了一条民主共和的道路——孙中山模式,即1911—1913年的中国早期议会制模式。然而,一夜之间国内竟出现了300多个政党,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而且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忠于国家和宪法的国家化的军队,只有处于政治混乱状态的忠于军阀的军队,这必然导致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的失败,以及强权人物的出现:①1913—1928年,中国出现了以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为核心组建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在解散国会后,袁世凯模式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政府,倡导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等。1914—1916年,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以11%的速度增加,这一时期成为国家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袁世凯政府的本质是内部结构缺乏政党制度和用意识形态作为组织内部的凝聚因素的军阀政治,其内部结构是庇护网关系——恩主与被保护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有点像朋党关系)。而且,袁世凯本人的现代化意识非常脆弱,复辟皇权的行为使他的权威受到极大损失。这两种因素使中国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北洋军阀混战的混战时期,并导致中国的权威主义进入了一种退化形态。②1928—1949年,北伐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建立了以国民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蒋介石的“党国”模式。北洋军政时期所产生的社会无序状态或者全面危机状态促使孙中山开始进行政治反省,并意识到需要由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因此,他按照苏联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进行了1923年的国民党改组,力图把原来作为议会竞争型的政党改造为组织型的政党,以达到实现强势政府的目的。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六期的子弟兵作为军事基础,以军事强人方式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且作为

一个领袖来推行国家现代化。这个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的优势在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而且用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凝聚基础,具有更强的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然而,国民党内部政治结构不但存在大量的军阀因素,而且形成了庇护网关系,上下属之间存在很强的宗法结构,如被收编的旧军阀军队无法整肃,地方军阀与南京政府互相承认无法做到真正统一;军阀文化很多负面影响渗透到了国民党体制中,使其内部结构的权力个人化倾向趋于显著。这种“凑合型”的权威政治根本无法应付日本入侵的危机和共产党的崛起,最终走向失败。

第三,1949—1978年,中国从资本主义社会快速转为苏联模式的典型计划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是三套马车——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模仿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经济制度,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不断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有机组合。为了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协调,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加之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在向苏联全面学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迅速转向了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在私人资本国有化和农业公社的建设过程中,比苏联做法要人性化和合理化一些,但整体经济系统的内涵和苏联毫无二致。中国共产党人虽也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力图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的决策机制,并采用了党政两套班子和人大、政协监督的政治体制,形成了1949—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国家现代化模式。萧功秦先生认为中国在实现了内部统一后,如能在1950s中后期放弃全能主义而转向一个新民主主义秩序,那么中国将是另外一个局面了。毛泽东实际上推行了整个社会的全能主义化,试图用计划经济模式推动国家富强,这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精英集团的部分人士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所引起的内部竞争是人类苦难和不平等的根源。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从政治学上属于一种全能的政治结构,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自上而下地贯穿执行行政党的使命。这种全能主义对付全面危机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当时,中国面临全面的危机,中国出现全能主义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形式是合理的,因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有一种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渗透能力,能把全国的下层群众动员起来,达到凝聚国力应付社会全面危机的效果。然而,随着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衡机制被人为打破,国家缺乏支撑科学决策的制度保障,最终导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性错误。而且,源于计划经济自身的官僚主义等弊端仅靠上层建筑自身根本无法消除,却被毛泽东同志认定为公有制以外的因素引发的,把官僚等问题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对无产阶级公有制的一种侵蚀,坚持发动了一场灵魂深处的上层建筑革命——文化大革命,反而导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及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1978年后的邓小平新政——改革开放模式。

2. “五位一体”的历史传统

中国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夏商周时期形成了“王道”模式,秦代实践了大一统的法统体制,汉代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治”封建体制,形成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五位一体”的“中华国体”。这个国体具备了以下特点:①存在一个五千余年的中华文化。这个文化体系具有集权、儒学、薄弱的公民社会的基本传统(顾朝林,2001),甚至还有全民崇尚权力的思想,缺乏崇尚西方民主思想的社会思想基础;②长期且强有力的行政体系——大政府、大社会的传统。这个行政体系与中央集权一脉相承,具有权威政

府的特点,中央集政治、军事、经济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中央集权以及大政府、大社会的中国传统,而美国社会则为小政府、大社会模式;③基于强势政府和单一文化思想主导的等级化社会结构及其组织体系,明朝朱元璋时期甚至出现了政府规定家庭职业(如军户、医户)的极端状态;④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系统。基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模式,国家往往形成了以自身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并轻视与国外进行真正的经济、技术交流。

“五位一体”的历史传统直接导致中国制度变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全面性、根本性特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片面而肤浅的变革注定很难取得成功,而只有当内外条件基本具备,基于系统化思考的渐进改革模式才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

3. 中华政体的传统特征及其优势

潘维(2012)认为,中华政体“熬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展示了超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向苏联、东欧、美国、西欧认真学习,既适应计划经济,也适应市场经济。中华政体主要依靠承担和保障整体利益的责任(如依靠中立的执政集团去平衡局部与整体、当前与未来、变化与稳定这三组利益关系);利用社会核心价值观塑造共同利益观以凝聚人民利益,而不是依靠暴力强力压制部分人群的利益;依靠西方民主的选举呼应部分和眼下的利益。因此,中华政体的树干包括:①官民关系信奉“民本主义”的民主而非西方的民主主义,即政府担当为百姓谋福利的责任,或为所有人民福祉承担责任的机构,并不是为社会利益集团牟取利益的平台,否则就应被推翻;②官员选拔方式以政绩考核为核心标准,采取“绩优选拔”,而西方国家“多数表决”的选举制度主要靠利益集团支撑,选拔出代表社会部分利益的官员;③统一的执政集团掌握核心权力机构。过去是拥有共同执政理念的儒家弟子组成的统一执政集团。今天的共产党是代表当代中国人民整体发展利益的执政集团,不是议会政治的党,不是某个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④始于秦汉,中国采用了“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政府犯错误,而西方国家采取了“分权制衡”模式。

1.1.2 中国的独特国情与制度转型

除了“五位一体”的历史传统,计划经济后期的独特国情和实际条件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模式。

1. 政治制度探索陷入困境和国人对政治改革更加充满期待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模式在艰难探索中经历了开明专制革新的失败(在传统文化惰性下的自我创新能力的极端贫乏)、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单项政治制度移植后缺乏权威主导后所形成的社会整合危机)、袁世凯强人政治的失败(虽具有相当强的社会整合能力但组织内部的资源极其贫乏,缺乏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同时它的内部结构是一种庇护网关系)、国民党模式的溃败(虽具有政党和意识形态作为组织资源的基础,但其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和后期的全面腐败还不足以面对全面的社会危机)、毛泽东模式的困局(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政治组织资源,但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全面排斥是其失败的根源)。

2. 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模式对转型路径的根本约束

中国的制度改革不但要在经济领域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市场化、工业化进程,而且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经济在1978年已濒临崩溃,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已降到

最低点,广大民众的生活已陷入穷困境地,迫切希望能在国家稳定中过上物质丰裕的美好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经济体系经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技术水平与西方国家的总体水平差距扩大,而且整个经济体系和经营主体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已消灭了市场环境和竞争意识,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培育起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只能采取渐进模式进行改革。况且,中国开放后所面临的世界各国已经过了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也只能采取渐进开放模式逐步适应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应遵循两个基本经济原则:一是通过和平的国家发展环境,与世界经济体系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经济联系和贸易联系;二是通过渐进的政策框架逐步在国内培养市场要素、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并通过市场化主体的培育,如国有企业转制和私有企业发展,稳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 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制约了制度转型的路径

在文化领域,中国社会没经历过类似西方国家“文化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民主思想在国内并没有深入的社会基础,基于民主思想的政权体制并不能在改革初、中期就先行建立,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且,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截至1978年已完全嵌入了马列主义的价值观,变成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体系。一方面,中国民众已淡化了竞争意识,形成了对国家深厚依赖和相信组织的惰性生活状态。这个典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虽然导致了民众对党和政府非常信任的情怀,有利于改革开放,然而也同时引致了民众对国家的强烈依赖,制约了民众尽快融入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因为广大民众转为竞争主体的角色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历经30年的基于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已成为中国官方的主流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当然会贯穿制度转型的始终,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完全扭转各个阶层的思想,走向俄罗斯崩溃疗法的制度转型道路,只能通过渐进转型模式让民众适应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4. 简单的社会结构对转型社会的约束性

根据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越复杂,稳定性越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经过了激烈的社会改造,形成了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非常简单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利于稳定,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不一定了。计划经济模式虽然物质福利供给贫乏,但也存在民众在生活、就业、福利等领域对国家的严重依赖,并产生了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只能通过渐进模式逐步规避这个社会结构的约束性,保持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稳定。

1.1.3 国际因素与中国制度变革的路径锁定:历史、现实与艰难抉择

1945—1970年代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制约了中国的制度变迁路径,形成了一定的外部环境约束与制度变迁演化路径的锁定。20世纪中后期,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时期的西方文明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较量中明显占据了上风,并随着苏联的全面崩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显而易见取得了至少是阶段性的压倒性胜利。这种胜利也带来了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社会优越性和文化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对中国制度转型模式的深层次的约束和转型路径的限制,如中国韬光养晦国策的制定。

1. 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

自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走向成功后,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制度三者相互促进,迅速使西欧成为世界的工业生产和贸易中心,标志着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崛起和苏联崩溃后美国成为真正的全球霸主,西方的政治生态文明走向了历史的顶峰,实际上成为全球各国模仿和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欧美发达国家的政体模式一般具有下列特点:一是议会、法院、政府严格的三权分立制度,其根基是忠于基于民主思想宪法的法统社会,即以宪法为依据,建立了健全严密的法制社会,透明化、监督化、理念化的权力运作体系保证了政治资源不被滥用;二是中央—地方宪法基础上的联邦体制,即地方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司法权力。这种体制在美国虽经历了南北战争分裂威胁的考验,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能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可抑制中央的错误路线或地方独大的政治问题;三是不断成熟的选举制度。虽然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基本上体现了民意,也抑制了一党执政可能长期犯错的可能性;四是权力监督和纠错机制的严格性。一旦爆出政治丑闻或者威胁民主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具有“零容忍”的能力,就是总统也必须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

人类的本性理论上倾向于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意愿,美国、西欧各国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更接近理想化的民主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全球其他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各国提供了一种实践背景下可供参考或模仿的范式,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的成功的效仿,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现代非洲很多国家并不成功的实践等。值得深思的是,苏联解体后,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了欧美政治模式,标志着世界后发国家学习和实践欧美政治生态模式的一种全球化浪潮——政治体制演进的一种路径锁定或路径依赖的现象,这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继孙中山三民主义后,第二次的全盘走向西式民主制度的巨大压力)方向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政治约束和诱导,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苏联及其东欧已转向西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历史上,东方文明全盛时期并没有扩展到全球范围,而工业文明和航海精神相结合的西方海洋文明却迅速扩张到全球范围和几乎征服了除中国(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和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以外的所有文化体系。这样,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即西方政治生态文明的成熟和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精英的分化和整合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惨烈失败以来,中华民族的制度转型事实上是在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与部分西化(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有限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经验)之间摇摆。民族精英们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取向明显分为三派:一是(全盘)西化派,如孙中山先生;二是(政治制度创新前提下的)坚守派,如毛泽东、邓小平等倡导在坚持东方政治制度精髓的基础上,汲取西方国家制度的先进经验或教训,进行符合中国文化价值观体系的体制性创新;三是二元(或多元混合、融合)派,如清末的张之洞、李鸿章等。

中国未能取得制度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甚至当前)无法具备欧美现代政治制度成功所需要的最为基本的历史基础和基本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民主政体是西方文明传承与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海洋文明在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历史产物。欧美政治模式首先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的民主政治思想,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建立适合于快速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为封建时期的专制政治体制必不适合自由市场经济